

第十一届“神学与人文学”暑期学术 研讨班综述

Review of the 11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米奥兰

MI Aolan

作者简介

米奥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I Aolan, MA Studen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helen.miaolan@ruc.edu.cn

Abstract

From July 6-9, 2015, the 11th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Summer Institute was held at the 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Henan province. The theme of this Summer Institute was “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rises”. Ten keynote speakers from the US, UK, Israel,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delivered presentations at the Institute. More than 40 young academics from 29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panel papers, discussing and exchanging views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rises”, the scholars presented papers within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from literary criticism to comparative studies on classics, religious studie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Sinology.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major concerns and issues raised during the Institute, including the crisis of faith behind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the crisis of interpretation in hermeneutics, and the ecological and identity crises of our current globalized world. The Summer Institute demonstrated the best academic effort to reflect on the modern way of life and to resolve longstanding dilemmas facing humanity.

Keywords: Theology, Humanities, Contemporary Crises,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5年7月6日至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河南安阳工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神学与人文文学”暑期国际研讨会于安阳工学院举办。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格拉斯哥大学、耶鲁大学、希伯来大学、马里兰洛约拉大学、辅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位专家发表主题演讲，并与来自全国29所高校的40余名青年教师展开学术交流和对话。

在“直面当代危机”（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rises）的主题之下，本届研讨班从东西文化普遍存在的对“神圣”的追求出发，以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视域探讨了当代文明在人类与自然、自我与他者、神圣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精神与物质的失衡状态下的生存之道。与会学者的讨论涉及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宗教研究、汉语神学、经典翻译、汉学研究等多个领域，探讨的内容既包括古老的文明冲突、学术论争、经典诠释及对“经典化”过程的考察，也包括当代日益凸显的生态危机、灾后重建问题、文化想象与文化身份、消费社会下的信仰真空等问题。旨在通过学术探讨反思现代生存方式，为摆脱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近年来，文学批评及比较研究越来越注文本的超验精神维度。这或许与后现代主义不断地否定权威、重估意义的“解构”，进而陷入西绪福斯式的困境后重新为主体觅得栖身之所的尝试有关。借助宗教与神学资源重新探寻蕴藏在文学与人之生存中的神圣追求与现世关怀，或许是所谓文学批评“宗教转向”的当代意义。

耶鲁大学司马懿（Chloë Starr）教授的《史铁生与当代知识分

子信仰的半影》(Shi Tiesheng,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Penumbra of Faith*) 通过分析史铁生的小说和散文,探讨了以史铁生为代表的同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寻找个体生存意义的历程。司马懿认为,史铁生关于人性、苦难、爱的思索与基督教神学存在深刻共鸣,但不应将其局限在基督教神学的理论框架之中。他对科学理性和权威的质疑、对个体的人的肯定和关注,以及对苦难的意义的思索在当代中国语境乃至不同文化所共同面对的当代危机中都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索。刘燕的《十字架上的叩问与告白——解读王桂林的组诗〈我的耶路撒冷〉》从“我一你”对话的视角阐释了当代诗人王桂林《我的耶路撒冷》组诗中用呼告、仰望靠近上帝的尝试。梁新军的《海子诗歌的神学向度及其意义》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了海子诗歌在“反客为主”的诗歌模式、“火”的意象、诗歌中的“天堂情节”及“倾空自我”的诗学思想四个方面的基督教渊源。

张变革的《幻想的爱与实践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问题》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时期作品中对爱的不同表达,并将之归纳为“幻想的爱”与“实践的爱”。前者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实际上陶醉于自我,指向抽象的“概括的人”,甚至会发展为对人的奴役。“实践的爱”是陀氏在揭示了幻想的爱对爱的扭曲的同时提出的构建前景,即肯定信仰、消除自我。

如果说陀氏的东正教信仰是理解其诗学与精神气质的入口,那么现代西方作家则是在对宗教普遍质疑的背景下书写人类在现代危机下的“宗教性”体验。秦烨的《末世·危机·救赎——以〈五号屠场〉与〈世界末日之战〉为中心》分析了两部20世纪的战争主题小说《五号屠场》与《世界末日之战》中末世形态的呈现样态,并援引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的“生存神学”,发掘末世叙事中的对话性、延续与重启。朱翠凤的《“神学”的叛逆与美国地方书写传统》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探究美国地方书写与基督教传统的关系,追溯了托马斯·杰弗逊、爱默生、杜威三个重要地方书写作家如何“改

造”传统的基督教义，使之关注的重点由不可见的灵魂及天堂转向可见的自然及地方书写。

自苏格拉底时期以来，诗与哲学之间难以调和的张力就成为了被人们反复讨论的命题。这场论争在二十世纪的哲学、宗教和社会背景下获得了新的语境。姜林静的《愁苦中的期待？——诗人魏斯和他通过思想家施米特产生的波澜》以及陈芸的《“神话诗学的回转”？——论伽达默尔对〈杜伊诺哀歌〉的诠释》讨论了20世纪超验的诗性语言与哲学思想的互释。前者解读了卡尔·施米特对诗人康拉德·魏斯推崇备至的原因，即二人在世俗的“语”与超验的“言”、在现实的“愁苦”与信仰的“盼望”之间的共鸣。后者集中梳理了伽达默尔对《杜伊诺哀歌》的阐释。陈芸认为，伽达默尔诠释思路的核心是“神话诗学的回转”，即搁置古代神话传统和基督教理念，回到“自我理解”，发现里尔克诗歌与神话、宗教的相关性，而非将诗文视为神话的再生或演绎。

对“他者”的关注和对单一立场和身份的挑战，是宗教研究与比较文学共享的品质。由此催生的关于文化想象与文化身份的结构分析使人们得以从社会、历史等不同角度重新审视经典文学作品。王涛的《从居室厅堂走向百货商店的女性——从左拉文学世界看女性消费群体的一次迁变》将左拉作品中的“家常琐事”纳入消费主义、女性身份、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考察。王涛结合凡勃伦、布罗代尔等人的资本主义批评及侨易学理论，认为左拉作品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炫耀式消费依然是为其丈夫彰显身份的“越位消费”，巴黎女性的时尚风潮实际是阶层划分的产物，是较低阶层对较高阶层的“仿变”与彰显本阶级共性的“仿常”的矛盾统一体，消费的女性成为了时尚的主人，却并非自己的主人。

二、宗教研究与汉语神学

随着人类用理性工具对世界的不断“祛魅”，习俗和传统价值失去了其终极和普遍意义。消费文化使人们的追求转向世俗世界，现代人仅依凭“当下”难以觅得长久的生存意义。在缺乏普遍价值和伦理的当代社会，正如德国神学家孔汉斯（Hans Küng）在世界伦理宣言中所说，“我们的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根本危机（a fundamental crisis），即全球性的经济、生态与政治危机。”^①人类正普遍意识到意义的失落与现代文化的局限，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而宗教，作为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深层次思考，当如何面对当今全球处境，走出各宗教间真理问题上的排他性，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积极的聚合力量。

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戴维斯教授（Anthony Oliver Davies）的发言《当今世界需要何种神学思想？》（*What Kind of Theology does the World Need Today?*）回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生物进化论、社会认知学的角度思考了基督教成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宗教的可能性。戴维斯认为，要实现人类的融合，需要我们把语言视作具有对话性的、人道的，求同的中介，而非物化他人的工具。基于这一文化设想，戴维斯建议重新思考已有的宗教实践，关注基础神学而非宗派斗争，重新发掘上帝的“体现”（embodiment）所具有的潜能。

格拉斯哥大学的纽兰兹教授（George Newlands）在本期研讨会的两次报告《人文精神与好客精神》（*Humane Spirit-Hospitable Spirit*）与《当代危机：精神、城市与垂直型城市》（*Contemporary Crises: the Spirit and the Vertical City*）均关注基督教在现代社会的角色。前者探讨基督

^① 世界宗教会议《世界伦理宣言》，芝加哥，1993年9月4日。[“The Declaration of a Global Ethics,” prepared by 200 scholars and presented at the 1993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held in Chicago, IL on September 4, 1993. Se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parliame.htm>.]

教的“好客”（hospitality）如何在现代社会的宗教和世俗维度发挥积极作用。纽兰兹认为，“神圣的好客”不仅限于基督教和基督教堂，它也是不同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共享的理想。在《当代危机：精神、城市与垂直型城市》中，纽兰兹站在西方基督教信仰者的视角，结合个人的中国经验，探讨基督教“圣灵”如何在中国这一“垂直型城市”发挥作用。纽兰兹建议不拘泥于所谓正典或权威去理解圣灵，而是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倾听东方文化和宗教的声音。

在汉语学术语境中，汉语神学学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在基督教思想中寻找资源以建构自身的学术体系，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资源构成了与基督教神学呼应的独特原素。曾庆豹的《中华现代性的危机——汉语批判神学与中国新左派的隐匿对话》旨在引导学界正视现代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存在过，但长期被主张“救亡”和“民族主义”的中国主流思想所排斥的一种左派基督教思想。曾庆豹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以汪晖为代表的中国新左派思想，并以现代中国基督教思想中的激进主义为资源展开对话，考察民国文人如吴雷川、沈嗣庄、张仕章、谢扶雅、吴耀宗等如何以一种相似于“左派基督教”或“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姿态回应来自现代性的挑战。

宗教学研究不仅是人类追寻生存意义的途径，也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愚教授的发言《心静则国土静——佛教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回应》以大乘佛教唯心净土的理论依据“心静则国土净”作为生态环保实践的理论基础，介绍了佛教中提倡人类人与自然共体共生的关系。宁欣的《上帝、自然与人：环境危机时代的生态主义神学》梳理了现代生态主义不同流派对传统基督教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介绍了三位当代基督教神学学者（Sallie McFague、Gordon Kufman、Anna Case-Winters）如何打破上帝与世界的悬绝，重构上帝、自然与人类关系的生态主义神学尝试，并对生态主义神学给予反思。

除此之外，不少学者通过重读和重释基督教经典，探索神学

与人文学互动的文化与历史意义。希伯来大学的惠特曼教授（Jon Whitman）的《信仰危机与实践危机：作为想象文学作品的圣书》（*Crisis of Faith, Crises of Fulfillment: Sacred Scripture as Imaginative Literature*）通过分析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薄伽丘、锡德尼（Philip Sidney）、赫尔德（J. G. Herder）以及巴尔（James Barr）等人对《圣经》与文学作品的论述，揭示了历史上《圣经》与文学互动的趋势：即基督教通过文学批评将《圣经》主题和术语与普遍意义上的文学关联起来。这不仅显示了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密切关联，也为人们理解今天的东西方关系提供了启示。孟振华的《用宗教经典回应当下危机——以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参孙〉（*Samson*）与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狮子蜜〉（*Lion's Honey: the Myth of Samson*）为例》通过解读两部20世纪犹太知识分子对于参孙故事的演绎，展示了宗教经典的重释与犹太历史问题的互动。欧振华的《夏娃，“肋骨”或是平等被造的伙伴？——试析犹太女性主义者对〈创世记〉1-3章夏娃来源叙事拉比释经的批判》重新考察经典拉比时期文献《大创世纪》、《巴比伦塔木德》中的夏娃来源问题，认为以朱迪斯·巴斯金（Judith Baskin）为代表的犹太女性主义者视拉比传统否认女性本质地位的判断有失偏颇。

无论是勦力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神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抑或乞灵于超验与信仰，神学与现代人文学研究的互动从未间断。林子淳的《神义的忿怒与人义的激情——从洛维特·布鲁门贝格论争到古今灵知论纠纷》回溯半个世纪前洛维特与布鲁门贝格之间关于现代性源起的经典争论，着重考察了其中有关灵知论的问题在学界中如何引发巨大回响。林子淳认为，尽管洛维特和布鲁门贝格对现代性历史哲学的病理学分析不尽相同，但二者都将整个现代性追索推向早期基督教教义形成的阶段，这一共同的关注引发了近代对广义灵知论的探索。林子淳注意到了当代对灵知论的关注与海德格尔所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想之间千丝万缕的学术谱系联系。林子淳认为，洛维特和布鲁门贝格争

论不仅是一场关乎宗教的学术论证，其背后是“正义”和“历史中的道义”的问题。无论矗立于东方还是西方，人类与历史道义之间的辩证是每一代人不断探寻的课题。

此外，宋旭红的《视觉、神性与图像——试论西方古典时代视觉中心主义的起源》回溯了西方“视觉中心主义”形成的过程，认为视觉中心主义虽然肇始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但人类的视觉与神圣的真理之间的真正联通是通过《圣经》传统而实现的。陈影的论文《“犹太人问题”中“宗教”与“世俗”的维度》认为鲍威尔与马克思论述犹太人问题的宗教和世俗化语境并非泾渭分明，二者争论的实质是人类获得自由、实现解放的途径。郑鹏的《福柯的宗教意义》一文梳理了学界对福柯宗教学的三种主流研究视角：福柯与否定神学、福柯与后现代神学、福柯与女性神学，并着力辨析了否定神学视野下福柯的宗教意义。刘子桢《从自然接受到批判扬弃——克尔凯郭尔生存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梳理了克尔凯郭尔生存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认为克尔凯郭尔的生存辩证法是对黑格尔思维辩证法内容在宗教和伦理领域的适用性的否定，同时亦是对黑格尔辩证法思维形式的继承。

三、经典翻译与汉学研究

神学和人文学之间的互动不仅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的范例，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加强对自身文化理解的重要途径。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的报告《“对极结构”（polarity）与“间距关系”（écart）——“金律”与“中庸”的双向解释》通过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对《论语》“金律”的译解与法国哲学家于连对“中庸”的阐发，探索如何通过中西交流概念工具的转化，重新揭示被表面的一致或差异所掩盖的东西话语的互释潜力。杨慧林指出，理雅各对《论语》中两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翻译没有被“肯定式”与“否定式”的纠结所限，

而是依据语境分别对“仁”与“恕”作了不同的翻译处理，同时将基督教的逻辑隐含其中。而于连则从西方外部的角度反观中国，将“中庸”理解为“种种极端之间的可能平衡”，从“间距关系”的角度为“不能精密译之”的中国概念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这启发我们，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不必涂抹分歧，也无需达成似是而非的表面一致，由自身视角出发的对“差异”的发现与深入思索，或许才真正有助于实现文化的理解与共存。

姜哲的《汉学与经学的互动——以〈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英译与诠释为例》和丁大刚的《辜鸿铭〈中庸〉英译文的现实关怀》均关注了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问题。前者梳理了马士曼（Joshua Marshman）、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理雅各（James Legg）、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等西方汉学家对《论语》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句的争论，即将“复”字理解为“反复”与“践言”两种主张。姜哲认为，西方汉学界对“言可复也”等经学问题的讨论，促使在中国传统经学中由于自身语言的同质性而缓解的问题以一种极为“醒目”的方式重新引起本土学者的关注，使经学得以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身。丁大刚借助福柯的话语概念，提出了“翻译话语”与“非翻译话语”的系统区分及译者话语的功能，并着重强调了“非翻译话语”对理解译者思想的重要性，并以辜鸿铭《中庸》英译本为例探讨了译者话语功能在文本中的实现。

来华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高志强的论文《教育、出版及翻译：马礼逊与理雅各时代作为东西方桥梁的英华学校》通过详细的史料考察，从教育、出版、翻译三个方面介绍了理雅各和马礼逊时期英华书院对东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李海英《近代西人汉语研究著述中的版本问题》结合一手海外汉学文献，针对近代西方汉语研究著述中译名不同、著者不同、文不对题、版次差异等版本问题加以甄别，考订了十余部较为重要的海外汉学著作的书名、译名及版次，帮助把握文献的基本内容和谱系关系。刘朴兵的

《利玛窦视野中的晚明饮食文化》从食物、宴饮活动、宗教饮食习俗等角度整理了晚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遗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记载，说明西方传教士从他者视角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观察与记述，对考据中国饮食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刘丽霞《从〈中国丛报〉看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基于对原始资料的考察与细读，分析了中国近代重要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5-1851.12）刊载的英译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并分析了其译介目的和翻译策略。

本届暑期国际研讨班延续了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研究视域，从“神学与人文学”视角反思当代危机，通过学术思索为人类摆脱共同困境做出了有益的尝试。